

## 從權力舞台到藝術場域：羅浮宮的前世今生（下）

馬藤萍

(續上篇)

### 「拿破崙博物館」之後

1815 年的滑鐵盧之役(Battle of Waterloo)結束了拿破崙的政治生涯，也連帶影響了羅浮宮廣納歐洲藝術品的蒐藏理想。同年，隨著自國外流浪歸來的路易十八(Louis XVIII)復位後，在拿破崙戰爭(Napoleonic Wars)期間而開始被清算，儘管德農館長極力阻止將文物歸還，並將「拿破崙博物館」的合法性，建立於其對藝術史、教育乃至於公共事業上重要性。然而，訴諸再多的開創性價值，都無法否認羅浮宮在拿破崙掌權下所表徵的「征服精神」<sup>1</sup>(l'esprit de conquête)。因此，隨著拿破崙的垮台，戰時被運至法國的比利時、義大利等

國的藝術品(兩千餘件)，有機會回到自己的源出國，其中知名的物件，如現藏於比利時布魯日聖母教堂(Église Notre-Dame de Bruges)的米開朗基羅的《布魯日聖母》(Madone de Bruges)，以及在 1797 年被拿破崙強行從威尼斯搬運至羅浮宮卡魯塞爾廣場(place du Carrousel)的《聖馬爾谷之馬》(Chevaux de Saint-Marc)(圖一)等。但事實上，仍有諸多傑作最終被留置於法國，如義大利畫家保羅·委羅內塞(Paul Véronèse)著名的《迦拿的婚禮》(Les Noces de Cana)(圖二)至今仍展於羅浮宮內。

隨著「拿破崙博物館」停留在歷史中，羅浮宮迎來了第二位館長奧古斯特·德·福賓(Auguste de Forbin)，此後羅浮宮只能透過購買或捐贈形式來擴充自身的藏品，如被視為



圖一：《聖馬爾谷之馬》。  
圖片來源：<https://reurl.cc/a1ZGy4>



圖二：《迦拿的婚禮》。  
圖片來源：<https://reurl.cc/LN5Xzx>

羅浮宮三大鎮館之寶的《米洛的維納斯》(Vénus de Milo)(圖三)，即是侯爵里維埃(Charles François Riffardeau de Rivière)獻給路易十八的禮物；以及於埃及出土的《丹達臘黃道帶》(Zodiaque de Dendérah)淺雕塑，則是經由法國官員索尼耶(Sébastien Louis Saulnier)而購得。然而，為了彌補大量藝術品歸還後的空虛，部分藏於盧森堡宮(Palais du Luxembourg)的藝術品，像是法國風景畫畫家韋爾內(Claude Joseph Vernet)的《法國海港》(Les Ports de France)系列畫作、法國新古典主義畫家厄斯塔什·勒·蘇爾(Eustache Le Sueur)的《聖布魯諾之夢》(Songe de Saint Bruno)等畫作。

## 展藏中東古文明

儘管非法的掠奪歐洲藝術畫作的行為已



圖三：《米洛的維納斯》。

圖片來源：<https://reurl.cc/b73GK6>

被大大地限制，但因拿破崙而開啟的中東考古活動，仍如火如荼地進行著，甚至一度成為羅浮宮的展藏重心。如繼任的查理十世(Charles X)也持續以收購的方式來經營羅浮宮，且出於他對古文物的愛好，羅浮宮再蒐藏了一批古羅

馬、古埃及和中世紀的文物，甚至派遣商博良至埃及進行考察，並成功向當地的英國外交官(Henry Salt)購得其七百餘件的古埃及文物，羅浮宮也因此於 1826 年成立了古埃及部門(Département des Antiquités égyptiennes)，並由商博良作為管理人，其中知名的文物《拉美西斯三世石棺》(Cuve du sarcophage de Ramsès III)(圖四)。

此外，位於今日伊拉克境內的亞述(Assyrie)古城「杜爾舍魯金」(Khorsabad)，也是在 1843 至 1855 年間，由法國領事博塔(Paul-Émile Botta)和普拉斯(Victor Place)帶領的考古團隊所挖掘，因此出土了大量亞述帝國的稀珍文物，使羅浮宮成為了當時第一展示亞述文物的博物館；且因著「杜爾舍魯金」由亞述國王薩爾貢二世(Sargon II)於西元前 717 年開始建造，但在此之前，對薩爾貢二世的認識僅存在於《聖經》<sup>2</sup>之中，眾人普遍認為這位亞述國王並不存在，直到法國考古團隊發現了「杜爾舍魯金」，才證實了《聖經》



圖四：《拉美西斯三世石棺》。

圖片來源：<https://reurl.cc/XLZ570>

中的記載。接續，法國考古學家薩澤克(Ernest de Sarzec)也在 1877 年，挖掘到了蘇美文明(Sumer)的古城「特洛遺址」(Tello)，其中的古物同樣被運回法國。再往東，法國考古團隊在伊朗也收穫了許多挖掘成果，在 1901 年至 1902 年間發現了「蘇薩古城」(Suse)，其屬於伊朗最早的文明「埃蘭」(Élam)，舉世聞名的《漢摩拉比法典》(Code de Hammurabi)便是在此發現。可以說，法國法國考古團隊在十九、二十世紀間的豐富收穫，使羅浮宮坐擁美索不達米亞(Mésopotamie)地區文明的古老文物，最終在 1881 年進一步成立了「東方文物部」(Département des Antiquités orientales)，成為少數擁有豐富中東文物的歐洲博物館。

另一方面，除了仰賴國家級別的海外考古行動，羅浮宮為了擁有更充裕的資金，也在 1898 年為了「羅浮宮之友」(Société des amis du Louvre)，而可以透過招募會員，累積蒐購資金、協助捐贈等事宜，羅浮宮也因此獲得了不少的珍貴畫作，如重要的法中世紀法國畫



圖五：《亞維農的聖殤》。  
圖片來源：<https://reurl.cc/rL3LDy>

家卡爾東(Enguerrand Quarton)，其現存於世的畫作僅寥寥數張，而羅浮宮便在 1905 年透過「羅浮宮之友」購得了其中的《亞維農的聖殤》(Pietà de Villeneuve-lès-Avignon)(圖五)一傑作。

## 當代羅浮宮的經營

兩次世界大戰之後，歐美國家迎來了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e)的挑戰，因而更多元的敘事視角、淡化東西方二元對立的辯證，促使羅浮宮乃至於歐洲各大博物館無不開始各自的經營轉向。而始於 1980 年代的「大羅浮宮計畫」(Projet du Grand Louvre)便是一個代表性的轉捩點，當時的法國文化部部長賈克·朗(Jack Lang)，即以「無牆的羅浮宮」<sup>3</sup>(Louvre hors les murs)一概念形容這項計畫及其背後的精神。

1981 年，法國前總統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為提升首都巴黎的各重要文化建設，提出「文化大建設計畫」(Grandes opérations d'architecture et d'urbanisme)，而「大羅浮宮計畫」即為其中一項，旨在改善羅浮宮已不敷使用的出入口、提升內部使用空間、更新展廳陳設等硬體上的整建。在諸多的整頓措施中，以下將針對「羅浮宮金字塔」(Pyramide du Louvre)與內部的展廳增設，以及二十一世紀後的新館設立計畫，體現羅浮宮的普世理想。

### (一) 羅浮宮金字塔



圖六：貝聿銘與「羅浮宮金字塔」。  
圖片來源：<https://reurl.cc/pL9LLd>

針對羅浮宮出入口的整建，由知名建築師貝聿銘(Ieoh Ming Pei)所主導，為整合原先分散於各展館的出入口，貝聿銘於中央廣場的拿破崙庭院(Cour Napoléon)中，設立一座高達 21.6 公尺、底座邊長 34 公尺的巨型透明金字塔(Pyramide du Louvre) (圖六)，作為新的羅浮宮入口，直達下方的拿破崙大廳(Hall Napoléon)，匯集了通往黎塞留館(Aile Richelieu)、蘇利館(Aile Sully)與德農館(Aile Denon)的出入口，整合羅浮宮的參觀動線，亦提升各展館之間的參觀流暢性。

在設計理念上，透明的三角形設計，大幅降低建材使用，提供更寬廣的視覺效果與使用空間，同時讓大量的自然光進入建築物中，不僅降低傳統建築對室外環境的阻隔，博物館內的觀眾亦能藉顯著的建築標示，辨別自身位置；再者，透過現代性的設計風格，重現古老的金字塔建築，古今融合的概念，呼應了貝聿銘為羅浮宮增設符合當代的現代建築時，亦不破壞羅浮宮建築群的古典風格<sup>4</sup>，且

貝聿銘也強調「金字塔並不是埃及才有的，它出現在許多文明之中。<sup>5</sup>」希望藉由「羅浮宮金字塔」凸顯多元文化主義的同時，這樣的建築設計巧思也恰好與羅浮宮的轉型理念不謀而合。

## (二)伊斯蘭藝術部門

在展館陳設上，羅浮宮在提倡多元文化共存共榮的趨勢下，其對未來文物的典藏與陳設空間更加重視，亦被列入「大羅浮宮計畫」中。法國政府在 1989 年將原設於黎塞留館內的法國經濟財政部(Ministère de l'Économie et des Finances)遷移，將空間還於羅浮宮，並作為展廳使用；接著在 1993 年啟用的黎塞留館，成為中世紀的法國與德國繪畫展示區，以及東方的藝術文物；1997 年重新開幕的蘇利館，則集中展示古埃及、古希臘與古羅馬文明的文與物雕塑；最後在 1998 年完工的德農館，展藏了近代的法國與西班牙畫作。

在展廳重設的基礎下，羅浮宮也在 2003 年增設「伊斯蘭藝術部門」(Département des Arts de l'Islam)(圖七)，於讓其館內約一萬四千件的伊斯蘭藝術收藏<sup>6</sup>，有獨立的管理部門與展示空間；再者，羅浮宮也是回教世界以外，擁有最多伊斯蘭藝術文物的博物館。於是，位於德農館翼的維斯孔蒂中庭(Cour Visconti)，遂規劃為伊斯蘭藝術展廳，也是羅浮宮建築群中最大的中庭。自 2004 年起，維斯孔蒂中庭亦開始整建工程，由法籍建築師魯迪·里喬

弟(Rudy Ricciotti)與義大利籍建築師馬里奧·貝里尼(Mario Bellini)共同合作。相較於貝聿銘在羅浮宮建築群外，豎立一座現代建築，居於古老羅浮宮建築群的維斯孔蒂中庭，要打造新式的設計風格，其困難度更高<sup>7</sup>。最終，兩位建築師在維斯孔蒂中庭的頂端，覆蓋一道由半透明玻璃與金屬支架，被稱之為「飛毯」(Tapis volant)(圖八)的波浪型屋頂，以此象徵伊斯蘭文明。伊斯蘭藝術展廳也於 2012 年開幕，展出了包含阿拔斯王朝、塞爾柱土耳其時期與印度蒙兀兒帝國等，橫跨歐亞非的伊斯蘭藝術文物，常設展品高達三千件<sup>8</sup>。

歷經八百年歷史的法國羅浮宮，透過這一系列的變革，改善其軟硬體的同时，亦是讓這座匯集了各文化、跨時代文物藝品的歐洲博物館能更完整地呈現人類文化的多元性，藉此成為更具有普世性的藝術舞台。而在「大羅浮宮計畫」下，先後誕生的「金字塔」與「飛毯」設計，猶如賈克朗的形容：「以東方傳說回應埃及神話<sup>9</sup>」藉此傳達羅浮宮內，「金字

塔」與「飛毯」兩種不同文化的對話，也體現了當前羅浮宮對文化他者的重視。

### (三) 跨國博物館合作

另一方面，隨著文化外交的興起，當代羅浮宮更進一步擔任法國文化外交「去中央化」(Décentralisation)的實踐者，除了發揮羅浮宮在國際間的文化影響力，也積極促成館際間的藝術品交流展示。

近年來，基於過去的考古活動的歷史淵源，羅浮宮與阿拉伯國家的博物館多有交流：如自 2003 年起，羅浮宮與埃及的開羅伊斯蘭博物館(Musée islamique du Caire)，展開為期六年的博物館整修工作協助，並在 2016 年，埃及國家文物部(Ministère des Antiquités égyptiennes, MSA)進一步與羅浮宮簽署合作協議，旨在促進開羅伊斯蘭博物館與羅浮宮，基於文化淵源，乃至於科學項目的合作，羅浮宮將接待該博物館之研究人員，於文化遺產的研究、修護、典藏與管理等，展開技術層面的交流；再者，羅浮宮的「伊斯蘭藝術部門」與開羅伊斯蘭博物館，亦將針對兩處文物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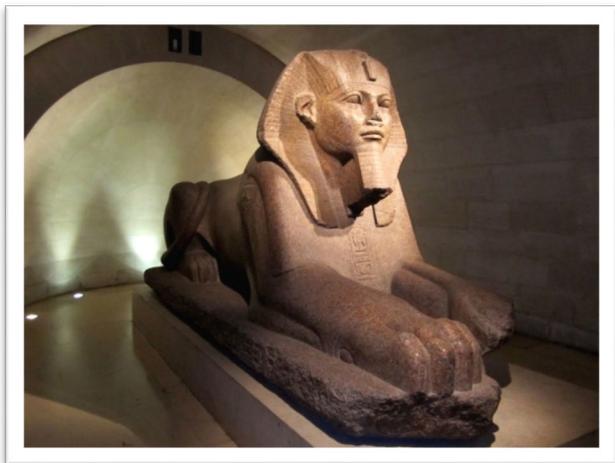
圖七：「飛毯」內部的「伊斯蘭藝術部門」。  
圖片來源：<https://reurl.cc/gZeZYR>



圖八：維斯孔蒂中庭的「飛毯」外部。  
圖片來源：<https://reurl.cc/n7q7Nv>

品所共有的歷史連結，進一步在 2017 年與 2018 年，先後於開羅和法國舉行跨館之文物展覽。

此外，在 2018 年的 3 月至 6 月間，羅浮宮也與伊朗國家博物館(Musée national d'Iran)進行了一次跨國展覽合作，羅浮宮與其附屬機構德拉克羅瓦美術館(Musée national Eugène-Delacroix)，共同提供了五十三件具羅浮宮發展歷史代表性之藝術品，如《人面獅身像》(Grand sphinx de Tanis)(圖九)、《馬可·奧理略皇帝》(L'empereur Marc Aurèle)半身石雕像等，具有彰顯羅浮宮作為中東考古行動先驅，並擁



圖九：《人面獅身像》。

圖片來源：<https://reurl.cc/NqbqnQ>

有世界性蒐藏的重要物件，將之外借至伊朗國家博物館；後者則提供十九世紀的波斯藝術(Art person)傑作至羅浮宮進行展出。再者，這一次的合作，更使羅浮宮的藏品成了第一批展示於伊朗境內的西方博物館之藝術文物。

## 結語

自羅浮宮成為公共博物館以來，乃至於法國諸多涉及文物蒐羅的境外行動，皆為羅浮宮擁有豐富且多元藏品的重要因素，尤其自拿破崙遠征埃及後，興起歐洲各國於東方的考古活動，促成法國對古埃及、伊斯蘭文明之藝術文物的研究與蒐藏；如今，羅浮宮仍與其部分藏品之源出國保持密切關係，甚且發展出多元的合作形式，自藏品、展覽的跨國合作，至博物館人員的技術交流等，皆說明了羅浮宮開始重視眾多外來館藏的文化淵源。

(本文作者為淡江大學法文系碩士班畢業生)

### 註釋：

1. Benjamin Constant, *De l'esprit de conquête et de l'usurpation : dans leurs rapports avec la civilisation européenne*, [Hanovre], Hahn, 1814.
2. 《聖經》對薩爾貢二世的記載，可見於《以賽亞書》第二十章第一節。
3. Jack Lang, *Les batailles du Grand Louvre*, Paris: Réunion musées nationaux, 2010, p.199.
4. 周鑫功，〈羅浮宮與羅浮宮博物館〉，《故宮文物月刊》，1995，第 13 卷第 7 期，頁 127。
5. Michael Cannell, 《貝聿銘：現代主義泰斗》，蕭美惠，譯，台北市：智庫股份有限公司，1996，頁 13-24。
6. 數據參考自羅浮宮官網：<https://www.louvre.fr/recherche-et-conservation/departement-des-arts-de-l-islam>
7. Jack Lang, loc., p.225.
8. 數據參考自羅浮宮官網：<https://www.louvre.fr/decouvrir/le-palais/a-la-decouverte-des-arts-de-l-islam>
9. Jack Lang, loc. cit.